# 从殷浩出发看东晋清谈

——论清谈的两种目的

【摘要】清谈由正始发展到汉末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东晋名士清谈的主要目的是表现自我、获得名利、为家族争光。殷浩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人物。东晋清谈的另一股风气的代表人物则是支道林。他清谈的主要目的则是辨明析理。本文从殷浩和支道林二人入手，梳理东晋清谈格局。

【关键词】东晋、清谈、支道林、殷浩、世说新语

【正文】

一、殷浩——自我表现的清谈

殷浩是东晋清谈界的杰出人物。当时另一位清谈名家谢鲲称赞他“既有佳致，兼辞条丰蔚，甚足以动心骇听”[[1]](#footnote-1)。据《世说·文学》记载：

“殷中军为庾公长史,下都，王丞相为之集，桓公、王长史、王蓝田、谢镇西并在。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,语殷曰：“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 。”既共清言，遂达三更。丞相与殷共相往反，其余诸贤略无所关。既彼我相尽，丞相乃叹曰：“向来语，乃竟未知理源所归。至于辞喻不相负，正始之音，正当尔耳。” 明旦，桓宣武语人曰 ：“昨夜听殷、王清言，甚佳，仁祖亦不寂寞,我亦时复造心，顾看两王掾，辄翣如生母狗馨。”

王导是东晋清谈界的领袖人物，正是他把清谈风习带到了江左。殷浩当时也已经因为清谈小有名望，被庾亮召为司徒左长史。两位清谈名家汇集一起，通宵长叹，自然是十分精彩。最终结果是“辞喻不相负”，可称得上是正始之音再现了[[2]](#footnote-2)。

然而，我们仔细分析《世说新语》中其他关于殷浩清谈的条目就会发现，“辞喻不相负”并不是殷浩清谈的常态，而是一个特例。

《世说·文学》：“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，往反精苦,客主无间。左右进食，冷而复暖者数四。彼我奋掷麈尾，悉脱落，满餐饭中。宾主遂至莫忘食。殷乃语孙曰：“卿莫作强口马，我当穿卿鼻！”孙曰 ：“卿不见决牛鼻，人当穿卿颊 ！”此条记载和上一条简直是天壤之别，从中我们可以还原出一个年轻气盛、意气风发的殷浩，誓要和对方一争高下。如果说殷浩和王导是两个名士在清谈，那么殷浩和孙安国简直是两个匹夫在吵架了。不辩倒对方誓不罢休。

《世说·文学》：“支道林、殷渊源俱在相王许。相王谓二人：“可试一交言。而才性殆是渊源崤、函之固，君其慎焉！”支初作，改辄远之；数四交，不觉入其玄中。相王抚肩笑曰：“此自是其胜场，安可争锋！”

支道林也是当时清谈名家，实力自然不弱，事情又被人提醒有了防备，但却依然仅仅四个回合就被殷浩引导到自己所擅长的才性论上。[[3]](#footnote-3)反观上文殷浩与“只谈声无哀乐、养生、言尽意”的王导竟然谈到了三更仍然不分胜负，这似乎不是殷浩一贯的作风。

另外，殷浩与支道林辩论透露出一种表演的痕迹。二人并不是有意地针对某一个论题展开讨论，而是凑巧碰面于是试着谈两句话。如果是为了学术交流而辩论，何必在意话题会被牵引到何处呢？如果不是因为重视输赢，又何必要防备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辩论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学问，更包括论辩技巧。这同样也是殷浩所擅长的。

《世说·文学》“刘真长与殷渊源谈，刘理如小屈，殷曰：“恶，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。”

《世说·文学》：殷中军虽思虑通长，然于才性偏精。忽言及四本,便若汤池铁城，无可攻之势。“云梯仰攻”、“汤池铁城”。

这些军事词语的应用一方面说明辩论的十分激烈，辩论的目的以分出胜负为目的；另一方面说明辩论中的技巧成分开始显现。以至于简文帝评论说：“渊源语不超诣简至；然经纶思寻处，故有局陈。”这说明殷浩的清谈与其说是胜在思想上，不如说胜在语言的组织上。甚至连输了的人都不觉得自己是在思想上输了，而是中了对方的诡计。如《世说·赏誉》：王仲祖、刘真长造殷中军谈，谈竟，俱载去。刘谓王曰：“渊源真可。”王曰：“卿故堕其云雾中。”

这种清谈的态度恐怕和正始之音是不太相似的。兹举一例。

《世说·文学》：“何晏为吏部尚书，有位望，时谈客盈坐。王弼未弱冠，往见之。晏闻弼名，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 ：“此理仆以为极，可得复难不？”弼便作难，一坐人便以为屈。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，皆一坐所不及。”

何晏条分缕析地向王弼阐述自己的观点，王弼也毫不逊色，不仅让在座众人哑口无言，而且还能自问自答继续演绎下去。这场辩论中没有多余的辩论技巧，也没有吵架一样的气氛，所有人在逻辑面前都心服口服。想来这番场景一定是十分优雅的。

这也许正是王导所向往的清谈境界。《世说·企羡》：“王丞相过江，自说昔在洛水边，数与裴成公、阮千里诸贤共谈道。羊曼曰：“人久以此许君，何须复尔？”王曰：“亦不言我须此，但欲尔时不可得耳！”北方士族过江后，不免怀念过去清谈雅集的风雅生活，于是有了“新亭对泣”这样的典故。王导过江后大力推广清谈，于是北方的优雅的清谈风习也被带到了江左。当时士族，似乎都憧憬正始之音。兹再举一例。

《世说·文学》：“王敦为大将军，镇豫章，卫避乱,从洛投敦,相见欣然,谈话弥日。于时谢鲲为长史，敦谓鲲曰 ：“不意永嘉之中，复闻正始之音。阿平若在，当复绝倒。”

王敦与卫玠同样谈了很长时间，卫玠又是美男子，与他相谈想必也是十分优雅的。结合王敦和王导对正始之音的想象，我们可以猜测东晋士族理想的清谈情景，应该是两人优雅地坐在一起，忘记时间和胜负，优雅地畅谈。

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殷浩和王导的对话了。须知殷浩当时是以庾亮的幕僚的身份与王导会谈的。“当时琅琊王氏的势力因王敦谋叛失败而显着削弱，庾氏势力渐有取代之势。……大概就在这期间，殷浩被庾亮召为幕中重要僚属，对王导来说，自然希望他在自己和庾亮之间起到调和作用。所以在殷浩离京之际，王导郑重为其送行，而显示他特别器重殷浩的方式，就是他以丞相的尊贵身份……与殷浩这位清谈家共谈析理。”[[4]](#footnote-4)而殷浩自然也明白这番道理，况且当时殷浩二十来岁，王导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，[[5]](#footnote-5)以王导地位之高，殷浩自然是不方便以跟孙安国、支道林清谈的方式来应付，他势必要收敛自己，以迎合王导对清谈的审美，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番故事。

由此则引出另一个问题。清谈在东晋时似乎并不仅仅为了共谈析理而存在，也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而包含了政治意义。

二、东晋清谈的内容

王僧虔《诫子书》是研究东晋清谈内容的重要材料。

《诫子书》云：“汝开《老子》卷头五尺许，未知辅嗣何所道，平叔何所说，马、郑何所异，《指例》何所明，而便盛于麈尾，自呼谈士，此最险事。设令袁令命汝言《易》，谢中书挑汝言《庄》，张吴兴叩汝言《老》，端可复言未尝看邪？谈故如射，前人得破，后人应解，不解即输赌矣。且论注百氏，荆州《八帙》，又《才性四本》、《声无哀乐》，皆言家口实，如客至之有设也。汝皆未经拂耳瞥目，岂有庖厨不修，而欲延大宾者哉？就如张衡思侔造化，郭象言类悬河，不自劳苦，何由至此？汝曾未窥其题目，未辨其指归；六十四卦，未知何名；《庄子》众篇，何者内外；《八帙》所载，凡有几家；《四本》之称，以何为长。而终日欺人，人亦不受汝欺也。”[[6]](#footnote-6)

由文章可知，东晋清谈沿袭了汉末清谈的主题，基本不超出其范围；然而其关键性的不同在于，这些主题之所以产生于汉末，有其特殊的时代原因，而到了东晋，催生出这些主题的背景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譬如，老庄思想在三世纪原本非常流行，其一大原因在于士人不堪受名教的束缚，主张解放个性，越名教而任自然。老庄思想也因此对名教产生了相当大的破坏性。但是到了东晋，老庄思想已经失去这层革命性，被当时的士族所广泛认同，已经无所谓什么名教与自然之争了。于是老庄思想也和一般话题一样成了社交场合的谈资。[[7]](#footnote-7)

又比如才性、四本的问题，这二者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。才性论讨论的是才能和品性何者更加重要，关系到选官的问题，特别是在名教曹操公开倡导“唯才是举”的冲突下，这个问题则尤为突出。[[8]](#footnote-8)而四本论问题据陈寅恪先生考证，则关系到曹魏和司马氏党派纷争的问题。[[9]](#footnote-9)王弼之谈无为而治，其实际的意图在于使皇帝无所作为，而使大臣得以专政。[[10]](#footnote-10)而东晋则完全失去了这些谈资产生的时代背景，东晋士族只不过是借了现成的题目当谈资罢了。

除了谈政治意味的消失，我们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。余英时先生认为汉末清谈实际上不仅包括人物评议，还包括思想讨论。对老庄思想的讨论也从原来的学术思想的讨论中演变而来。[[11]](#footnote-11)既然是学术活动，那么不免要著述立论，当时清谈名家如何王嵇阮皆长于此。鲁迅说：“东晋以后, 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, 由《世说新语》一书里可以看到。……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，因为他们的名位大，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，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，他们实在的内心，却不知道。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，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。……在文学上也这样，嵇康阮籍的纵酒，是也能做文章的，后来到东晋，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，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，却没有了。”[[12]](#footnote-12)鲁迅所言确为事实，东晋的清谈确实只学到了正始清谈的表面。何晏、王弼、嵇康、阮籍都是不但能清谈，而且能着论的人，可是自中朝以来写作和着论逐渐分离开了。比如《世说·文学》：“太叔广甚辩给，而挚仲治长于翰墨,俱为列卿。每至公 坐，广谈，仲治不能对；退，着笔难广，广又不能答。” 《世说·文学》“江左殷太常父子”条下刘注引《中兴书》云：“兄子浩, 亦能清言, 每与浩谈, 有时而屈。退而着论, 融更居长。”东晋的学术创新也远少于正始，可见东晋清谈已和正始清谈大不相同。

既然东晋清谈已经失去了政治关联性和学术性，那么东晋认识又为为何如此热爱清谈呢？《金楼子》卷四《宣言篇》云：“余以孙吴为营垒，以周、孔为冠带，以老庄为欢宴，以权实为稻粮……”[[13]](#footnote-13)东晋士族已不再像汉末士族那样受制于王权，同时又生活在江左这一山清水秀、物产丰富的地带，此时他们需要的正是享乐。“以老庄为欢宴”，当时名士崇尚老庄恐怕更多的只是崇尚老庄逍遥自在一面。一边畅谈着老庄玄理，一边饮酒作乐，这恐怕正是当时名士追求的生活。

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：“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。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宣言，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，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。”

然而，根据《诫字书》的描述，清谈在社交场合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清谈是一个人身份的标记，倘若一个人不善清谈，在清谈中落了下风，是一件非常丢面子的事情。特别是在东晋这样一个门阀制度森严、家族意识浓厚的社会中，在社交场合中的表现不仅会影响个人的身份，更关系到家族的名誉，乃至政局的变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不全面的：东晋清谈的内容固然已经失去其政治意义，但清谈这一活动本身则被赋予了更大的政治意义。[[14]](#footnote-14)我们不可否认有些名士确实是因为发自内心地喜欢清谈，其本人对玄学也有极大兴趣；但是当清谈成了权势者共同推崇的活动后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清谈或多或少变得不“清”了。

如果当时的人都是这种清谈态度的话，难怪王敦王导想不到会复闻正始之音了。

**三、清谈作为一种自我表演**

余英时先生认为清谈的风行和魏晋时期士人自觉有关。魏晋士人之自觉一方面是出于求得名声、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；另一方面是出于张扬个性、挣脱礼法的要求。这两者有时候是统一的，但细分之则不同。清谈则正是这二者统一的表现。清谈一方面可以展现自己的学识和才华，给自己带来名望；另一方面也可以彰显自己的个性，而不至于太锋芒毕露、惹祸上身。[[15]](#footnote-15)如东汉王祥以孝而闻名，但他并未反抗体制，而是通过体制实现自我；而竹林名士如嵇康则是通过明目张胆地反抗名教、任诞不羁来表现自我，这是个性自觉程度极高的表现，这一时期恰恰是政治氛围最为紧张的时期。而到了西晋，士族豪门的利益已经和司马政权打成一片，士人们无所谓仕不仕。于是清谈彰显个性的功能慢慢退化，其表演性日益突出，进而成了士族的生活方式。这一时期的自觉又类似于东汉末年的时期，士人们实现自我的方式不是反抗体制，而是与体制合作，

虽然殷浩在和王导清谈时作了一方谦让，但是他已经给王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东晋清谈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表演。

根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张凭举孝廉之后去拜访刘惔，一开始刘惔并不在意他。但是当张凭一展清谈才华后，刘惔立刻就邀请他上座，还举荐他为太常博士。

《世说·文学》：“康僧渊初过江，未有知者，恒周旋市肆,乞索以自营。 忽往殷渊源许，值盛有宾客，殷使坐，粗与寒温，遂及义理， 语言辞旨，曾无愧色，领略祖举，一往参诣。由是知之。” 由此可见，清谈是当时的普通人高升的关键。如果擅长清谈，便可一步登天，无怪乎清谈当时如此盛行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东晋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，一个人的崛起往往意味着一个家族的崛起。东晋过江的家族大多是玄学家族，都很重视家学。清谈是东晋士族维护门第的重要基础。士族的维持除了需要政治资本，还需要文化资本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：“所谓士族者, 其初并不专用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表征, 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以标异于其他诸姓。”[[16]](#footnote-16)

为什么门阀士族要靠清谈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呢？私以为，政治力量可以靠武力夺取（如桓温），但是文化不然。文化历来掌握在社会精英阶层手中，非世家大族所不能拥有。当时之清谈，正如今日之教育。门阀士族垄断教育资源，即相当于把一般人排除于教育之外，也就是阻断了体制内社会成员的流动，普通人也就无法进入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循环之中，平民和贵族之间不可逾越的沟壑也就能长久地保存下去。

谢氏家族虽然声名显赫，但是直到东晋之前，都屡遭歧视。《世说新语·简傲》：“ 谢万在兄前，欲起，索便器。于是阮思旷（裕）在坐，曰：‘新出门户，笃而无礼。’”[[17]](#footnote-17)据田余庆先生考证，谢鲲的父亲”谢衡学行是笃守传统的儒宗，看不到一点元康名士的玄学气习。这样的人，显然不会为时所重，为士流所倾心。”田余庆先生还分析，谢氏家族之所以能崛起，其原因除了政治因素以外，一大因素正是谢鲲由儒入玄，取得了进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条件。[[18]](#footnote-18)直到谢鲲成为王敦幕府成员后，谢家与江左士族交往才多了起来。谢家这才在士族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。其后谢家清谈人物更是层出不穷。

桓温也是如此。谯郡桓氏在江北影响不大，过江之后才渐渐崛起，但仍然不是第一流的家族。从桓温的传记里可以看出，桓温与其说是一个名士，更像是一个侠客，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热衷于清谈。但是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，他要想在东晋士族社会中立足，也不得不顺从这一潮流。以至于虽然他在殷浩和王导清谈时什么也没有做，临了也要评议一番，以示风雅。《世说·文学》载：“宣武集诸名胜讲易，日说一卦。”可见他也是清谈的组织者。但其实桓温自己并不擅长清谈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五四引《语林》曰：“桓宣武与殷、刘谈，不如甚。唤左右取黄皮袴褶，上马持矟数回，或向刘，或拟殷，意气始得雄。”[[19]](#footnote-19)而且他自己也不喜欢清谈，以至于发出“遂使神州陆沈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，不得不任其责！”的感叹。可见他骨子仍然是个军人，而不是名士。但他受当时氛围影响也不免积极参与清谈活动。可见当时清谈风气之盛行。

最典型的以清谈发家的当属陈郡殷氏。据《晋书·殷浩传》载: “浩识度清远，弱冠有美名，尤善玄言，与其叔融俱好老、易。融与浩口谈则辞屈，着篇则融胜，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所宗。”论述和清谈是两个主要的学术活动。着论对思维的严密性的要求比清谈要高得多。殷融虽然在才思方面胜于殷浩，但是却不如殷浩能说会道（或者说擅长辩论技巧），于是也不如殷浩有名。正是殷浩才把殷氏带入了一流士族的行列。陈郡殷氏在中朝地位并不显着。但是由于殷浩擅长清谈、受到重用，因而开始显赫。殷浩通过清谈积攒了巨大声望，然而他此时却开始隐居。于是他的名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《世说·赏誉》：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。于时朝野以拟管、葛，起不起，以卜江左兴亡。”最后他终于接受征召，受命与桓温抗衡，殷浩的人生也因此达到巅峰。[[20]](#footnote-20)

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则是琅琊王氏。北方士族刚刚过江时心情十分低落，从而有新亭对泣的故事。《世说·言语》：“卫洗马初欲渡江，形神惨悴，语左右云：“见此芒芒， 不觉百端交集。苟未免有情，亦复谁能遣此！”” 王导位居丞相，有极大号召力。在他的推动下，清谈很快成了江左名士的日常活动。清谈为南迁士族营造出了一个熟悉的环境，具有稳定人心、抚平创伤的作用。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卫玠很快就加入王敦幕府，通宵清谈，丝毫没有亡国之痛了。

《世说·言语》：“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，谢悠然远想,有高世之志。王谓谢曰 ：“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 ；而虚谈费务，浮文妨要,恐非当今所宜。”谢答曰：“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岂清言致患邪？””

谢安同样继承了王导偏安江南的政策。谢安的言下之意是清言自有其意义。当时东晋王朝实际上无力反攻北方，当务之急是调和江南士族之间的矛盾，而清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。从中也可以看出谢安作为大政治家的眼光。

王导之所以倡导清谈恐怕不全是为此。王导自己本身是东晋清谈最有资历的人，他对自己在清谈界的地位也十分看重。

《世说·企羡》：“王丞相过江，自说昔在洛水边，数与裴成公、阮千里诸贤共谈道。羊曼曰：“人久以此许君，何须复尔？”王曰：“亦不言我须此，但欲尔时不可得耳！”

《世说·轻诋》：“王丞相轻蔡公，曰：「我与安期、千里共游洛水边，何处闻有蔡充儿？’”王导此处就以自己之前曾与王承、阮瞻在洛水边清谈而自豪，诋毁政敌。

因此，王导倡导清谈，他自己恐怕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我们也看到，南迁士族大多集中到建康王导幕府和武昌王敦幕府之下了，这对琅琊王氏无疑是很大的帮助。整本《世说新语》唯有王导、王敦提到正始之音，恐怕并不是巧合。正因为他们本身是清谈最大受益者，所以才如此倡导清谈。

王导当时位居丞相，因此有极大号召力。在他的推动下，清谈很快成了江左名士的日常活动。琅琊王氏家族本身也极其重视清谈，以至于有诫子书。

四、结语

由此可见，东晋清谈之意义和正始已完全不同。其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不是在清谈的内容上，而在于清谈本身。清谈成为一般人平步青云的天梯，也成了门阀士族维系自身地位的家学。想到这里，也无怪乎王敦、王导不约而同地感慨：想不到会又能听到正始之音了！

参考文献:

[1] 王晓毅. 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[J]. 史学月刊, 2001(4).

[2] 王建国. 论清谈文化与东晋门第之关系[J]. 天中学刊, 2008, 23(6).

[3] 汤用彤, 任继愈.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 [J]. 历史研究, 1954(3).

[4] 余嘉锡. 世说新语笺注[M]. 中华书局, 2007.

[5] 田余庆. 东晋门阀政治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89.

[6] 唐长孺.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[M].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0.

[7] 余英时. 士与中国文化[M].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7.

[8] 余英时. 王僧虔《诫子书》与南朝清谈考辨[J]. 中国文化, 1993(1).

[9] 万绳楠整理.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[M].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2.

[10] 骆玉明. 世说新语精读[M].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2.

[11] 陈寅恪.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[M].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4.

1. 余嘉锡. 世说新语笺注[M]. 中华书局, 2007。按：下文引《世说新语》皆出于此书，不再标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按：正始清谈源自于学术交流，故清谈之目的在于思想交流，“辞喻不相负”意味着双方各有收获，乃思想交流之佳境。参见《世说•文学》：“傅嘏善言虚胜，荀粲谈尚玄远，每至共语，有争而不相喻。裴冀州释二家之义，通彼我之怀，常使两情皆得，彼此俱畅。”傅嘏擅长谈名理，荀粲擅长谈玄远。这两人观点看起来截然对立，但是经过调解之后居然能两情皆得、彼此俱畅。这正是所谓“辞喻不相负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按：支道林之所以这么快就失败恐怕与其清谈观有关。《世说•文学》记载许掾为了表现自己，与人辩论；赢了之后故意互换观点，再辩一次，又赢了。于是他问支道林自己表现如何。谁料支道林从容答道：“君语佳则佳矣，何至相苦邪？岂是求理中之谈哉？”可见，支道林清谈的目的并不是分出胜负，而是求理中之谈。或许正是因此，他才能够独创逍遥新意。《世说•赏誉》：“王长史叹林公：“寻微之功，不减辅嗣。”可见支道林反而是有正始之风的。这一点或许也正和他僧人的身份，与士族门阀利益无涉有关，所以能洁身自好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骆玉明. 世说新语精读[M].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2.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王建国. 论清谈文化与东晋门第之关系[J]. 天中学刊, 2008, 23(6).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转引自余英时. 王僧虔《诫子书》与南朝清谈考辨[J]. 中国文化, 1993(1).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按：可类比于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之初也具有相当的革命性，其革命性一直延续至上世纪中叶。然而如今，马克思主义也已几乎被同化，与其他思潮并无差别，成为一个可以放在台面上大大方方研究的题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参见：唐长孺.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[M].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0. 《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》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参见：万绳楠整理.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[M].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2.《清谈误国》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参见：汤用彤, 任继愈.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 [J]. 历史研究, 1954(3).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余英时P326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而已集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转引自余英时. 王僧虔《诫子书》与南朝清谈考辨[J]. 中国文化, 1993(1).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按：由此我们也就可以重新审视鲁迅的观点。鲁迅认为后来清谈家之所以不会著论，是因为他们学前人没学到家的缘故。但实际上，东晋清谈目的已变，不再以学术为目的。著论是一个学术性的活动，既然清谈的重心已转移到清谈这一社交活动本身上来，又有什么著论的必要呢？殷浩善谈不善写，殷融正相反，结果是殷浩名声更大，这或许可以说明著论之所以式微，实在是因为它带给人的声望有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从这一角度来看，何晏喜欢涂粉，殷浩喜欢争输赢，都是清谈之表演性使然，本质是一样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陈寅恪.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[M].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4.P259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转引自：田余庆. 东晋门阀政治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89.P190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田余庆. 东晋门阀政治[M].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89.P192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转引自：王建国. 论清谈文化与东晋门第之关系[J]. 天中学刊, 2008, 23(6).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按：殷浩是个非常重视声望的人。刘惔曾说：“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？”可见时人已经看穿殷浩的如意算盘。《世说•文学》“殷中军读小品”一条下，刘注引语林曰：“浩于佛经有所不了，故遣人迎林公，林乃虚怀欲往。王右军驻之曰：‘渊源思致渊富，既未易为敌，且己所不解，上人未必能通。纵复服从，亦名不益高。若佻脱不合，便丧十年所保。可不须往！’林公亦以为然，遂止。”王羲之曾几次劝说殷浩放弃北伐，但殷浩都不听，王羲之对殷浩的为人可以说是十分了解的。同时王羲之对于清谈活动的本质也很清楚。所以他一眼就看出，这场清谈并不只是学理交流，更关系到名望。因此他劝说支道林不要去，以免失败后有损名望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